

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

——回忆我的父亲杨度

● 杨云慧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

——回忆我的父亲杨度

杨云慧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cong
baohuangpai
dao
mimi
dangyuan

责任编辑：何国栋

装帧设计：范一辛

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
——回忆我的父亲杨度

杨云慧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5 插页 7 字数 105,000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200册

书 号：11077·3002

定 价：1.30元

夏衍序

杨云慧同志是杨度同志的女儿，要我给《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一书写序。关于杨度同志，我先后写过几篇专文，这里就以《杨度同志二三事》一文为主，再补充上几句，以应厚命。

我在《杨度同志二三事》一文中写道：

“读了王冶秋同志的《难忘的记忆》，我想起了杨度同志的一些往事。

“杨度同志的入党，不在一九二六或一九二七年，而是一九二九年秋。从李大钊同志牺牲后，他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和章士钊先生一起，奔走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周济被难者的家属。到上海后，他加入了‘中国互济会’，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经人介绍，他申请入党，得到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周恩来同志离开上

海后，组织上决定由我和他单线联系。他当时住在上海旧法租界薛华立路附近的一座小洋房里，我每月跟他联系一次，送给他一些党内刊物和市上买不到的‘禁书’也和他谈些国内外形势——主要是我们所知道的中央苏区的战争情况。他从敌阵中来，知道许多北方军阀、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谈到这些问题时，他常常高谈阔论，奇谈惊人。他还曾不止一次地把他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要我转给上级组织。最初我不知道他的真名，只知他是一位姓杨的秘密党员。后来逐渐熟悉了，他才告诉我：‘我就是杨哲子’。当时我的确也大吃一惊。

“关于李大钊同志牺牲前后的经过，他也和我谈过，大致和陶菊隐先生所著《六君子传》的记述相同，即他从汪大燮口中知道了张作霖已派便衣军警包围了俄国兵营，准备逮捕中共地下党员的消息，当晚就要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通知中共组织（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是由于有人不相信张作霖会冒跟外交使团冲突的危险，推迟了撤退时间，以致李大钊等三十五人被捕。杨度同志和章士钊先生等奔走营救无效。李大钊同志等二十一人被处绞刑。这件事，抗战时期我在香港问过当事人胡鄂公先生，所述也和杨度同志的自述相符。杨度同志入党的事，逐渐为外人所知，有人说他投机。他曾对我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是杀头灭族之机。’

“近代史家谈到杨度时，都说他傲慢自大，是个‘知过不改’的人，特别在袁世凯死后，他还对新闻记者说：‘宁受审判，不能认错。’但是，至少在他晚年，我认为他倒是很

善于自我解剖的。他对我说过：‘我平生做过两件大错事，一是辛亥革命前，我拒绝和孙中山先生合作，说黄兴可以和你（指孙中山）共事，我可不能和你合作，对这件事，我后来曾向孙中山先生认过错；二是我一贯排满，但我不相信中国能实行共和，主张中国要有一个皇帝来统治，这件事直到张勋复辟后，我才改变了想法。’

“他在上海住的房子是杜月笙送的。他虽自称卖字画为生，但实际上他的生活是由杜月笙供应的，因此上海小报上都说他是杜月笙的徒弟，但他不承认。他说：我一没有递过帖子，二没有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哲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而是‘清客’。这句话含有自嘲的意思，但我认为是可信的。解放后也有人说，在‘杜公馆’他的地位和章士钊先生相似。但据我所知，杨度同志晚年生活简朴，不挥霍，无嗜好，也不为杜出谋策划，因此，杨章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杨度同志在军阀、官僚、政客中，度过了大半生，一旦觉悟，可以反戈一击。但是，他的道路是崎岖的，在思想作风等方面，还是有许多矛盾的。例如，他入了党，还相信佛数，写过一部篇幅很大的研究佛学的书，有时，还和我谈过所谓‘禅悦’之类的问题；又如，他在同志间从不互称同志，更不必说象我这样年轻的联络员了。谈起周恩来同志，他是十分敬佩的，但也还是开口翔宇兄，闭口伍豪先生。习之难改也如此。

“周恩来同志对我不止一次地谈起过他。解放后，当我告诉他杨度同志的女儿杨云慧同志回国后，已在电影厂工

作，周总理很高兴，说：她有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读了王冶秋同志的文章，知道总理病重期间，还想起杨度同志，让后人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这件事使我非常感动。现在，知道杨度是‘筹安会六君子’者多，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者少，因此，跟他有过工作关系的人，有实事求是地说明事实、表扬他的晚节的责任。”

我写这短文的时候，由于潘汉年同志还没有平反昭雪，所以文中只写了“经人介绍”，“得到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关于我认识杨度同志，也只写了“组织上决定由我和他单线联系”，事实上，杨度同志入党的介绍人就是潘汉年，要我和他单线联系的“组织”也是以潘汉年任书记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对此，我在《纪念潘汉年同志》一文中，还有一段记述：

“这一年（1931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潘汉年）介绍给我一位五十岁出头一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脱，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客套。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也不说，我也猜到这不是什么珍贵的礼品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

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这之后，我和潘汉年同志阔别了五年，直到抗战前夕才再次会面。”

我和杨度同志单线联系的时间不长，但我知道他在晚年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掩护过地下党，按期交党费，还对我说过，他曾不止一次规劝过杜月笙，劝他不要再为国民党卖命。

一九八六年五月

夏衍序

目次

写在前面·····	1
第一章·····	5
一 父亲的幼年·····	5
二 受教于王闾运·····	9
三 我的姑母·····	11
四 三次考试·····	13
五 去日本留学·····	16
六 “经济特科考试”风波·····	18
七 第二次到日本·····	20
八 与孙中山的交往·····	25
九 与梁启超的友谊·····	26
一〇 代庖·····	28
一一 奔丧·····	30
一二 进“宪政编查馆”·····	31
一三 颐和园讲课·····	33
一四 我的祖母·····	35
一五 我的生母·····	37
一六 筑路风潮·····	40
一七 学部副大臣·····	44
一八 与齐白石·····	46
一九 再次保荐梁启超·····	48
二〇 与蔡锷·····	50
二一 请老师出山·····	53

二二	我的两个哥哥·····	56
二三	袁世凯送匾额·····	58
二四	家庭风波·····	59
二五	几面不讨好·····	61
二六	袁世凯死了·····	64
第二章	·····	67
一	移居天津·····	67
二	深居简出·····	69
三	华昌公司·····	72
四	张勋复辟·····	74
五	迁回北京·····	76
六	表姐的悲剧·····	78
七	研究佛学·····	80
八	写字吟诗·····	83
九	为孙中山解围·····	85
一〇	拍案而起·····	87
一一	大哥回来了·····	89
一二	三叔一家·····	92
一三	巨星殒落·····	95
一四	迁居苏州·····	97
一五	反帝高潮·····	99
一六	入张宗昌幕府·····	100
一七	“当心脑袋”·····	102
一八	营救李大钊·····	104
一九	我的心事·····	106

二〇	去青岛·····	108
二一	在上海·····	109
二二	与陈赓、潘汉年相识 ·····	112
二三	二哥回国·····	114
二四	忙于为党工作·····	116
二五	演戏和结婚·····	119
二六	父亲逝世·····	121
第三章	·····	125
一	父亲逝世以后·····	125
二	三弟失踪·····	128
三	“七·七”事变·····	130
四	大轰炸·····	133
五	我在成都演戏·····	134
六	会见周恩来·····	136
七	二妹云碧·····	137
八	我第一次回国·····	143
九	我第二次回国·····	145
一〇	郭有守起义·····	147
一一	周总理解危·····	149
一二	陈毅谈我父亲·····	151
一三	五弟之死·····	152
一四	周总理的关怀·····	156
一五	父亲的入党期·····	158
一六	人民没有忘记他·····	159

写在前面

自从一九七八年八月，党中央宣布了我的父亲杨度曾经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为党做了一些工作以后，“杨度同志”这个名称几乎家喻户晓了。

我父亲从一个竭力鼓吹君主立宪，提倡帝制，而且又是非常自傲的人物，后来却成了秘密的共产党员，这里面当然有许多思想斗争。这个过程对他来说，是艰难的，也是痛苦的，绝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袁世凯倒台后，我父亲的名字总是和袁世凯连在一起的。二十年代以来，许多人为我父亲著书写传，或是搬上舞台，多半是贬多于褒，有的更是无稽的中伤。直到公布了周恩来总理的临终遗言，人们才开始了解我父亲真正的政治面貌。

人们常说“盖棺论定”，而我父亲却在坟墓三迁以后，才有了定论。

当年社会上对我父亲的压力是够大的，以致在他去世后多年，还涉及到妻儿的身上。这又使我们能有什么可说的呢！

现在又有许多人在为我父亲著书写传了，甚至一本不够，写上两本。先是骂他，后是赞他；其中有正确的一面，也有不正确的一面。有人把我父亲的出生年月、居住地点弄错了；有人把我父亲说成是贪财索价、唯利是图的市侩；也有人把我父亲（一个文弱书生）描写成为现代的工人阶级形象；还有人则把我祖父写成吹鼓手……

关于这些牵强附会的记叙，我感到有必要澄清一下，以备日后人们实事求是地了解这一历史人物。

我以杨度的女儿的身份，只能写一些我父亲生平的生活、思想、行动等等。我无法为父亲作传。本书的内容，有些是我回忆所及；有些是我母亲和姑妈生前所述；有些来自我叔父的遗墨（十年动乱中，我曾在四叔杨漱家中的一堆灰烬里，拾到一本《哲兄遗墨》）……

父亲主张君主立宪时，我还年幼，不可能懂得什么。如今，我家上无长辈，两个哥哥也已相继去世，我算是最大的女儿了。我有这个责任，将父亲的言行回忆并整理出来，编写成书，让后人传阅，以区别于外间的流言蜚语。同时，也可使广大读者认识到，一个爱国主义者所走过的道路，并不都是那么简单的，有的甚至非常曲折。但是，只要他真心爱国，即使象我父亲那样顽固的君主立宪派，最后还是捐弃了成见，投到无产阶级阵营中来了。

最初，我没有信心完成这本著作，后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以及各方面友人对我的鼓励和支持，并指出其不足之处，才使我得以完成。在出版过程中，还得到了祝文品、枫春两同志的帮助。谨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杨云慧

一九八六年八月

第一章

一 父亲的幼年

我父亲生于一八七四年（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我们的老家，是湖南湘潭姜畲镇石塘乡。

石塘乡离姜畲不远。因为那里有一个完全用石头堆砌成的池塘，大家就叫这个地方为石塘乡。那池塘水清碧净，鱼翔浅底。石塘北面有块平整的土坪，是筛晒稻谷的场地。绕过石塘往后走，有一大排朝南的瓦房，顶上覆盖着青灰色的瓦片。这里住着我家祖父辈好几房弟兄。屋后群山环抱，丛林茂密，风景很是秀丽。那里还安葬着我杨氏的几代祖先。

我家原籍江苏金陵（今南京）。我只知道最早的祖先名叫惧高。明朝末年，他从金陵玄武湖移居到湖南，安家立业。后来子孙繁衍分布于湘潭、衡山两县。我家早先以务农为生，后来就分散到了各行各业中去。因为人口逐渐增多，到了第十三代，这个大家庭开始用一首诗来规定各代排辈取名的依据。这首诗是：

景代隆清叙，家承孝友传。

敦诗兼学礼，裕后益先前。

我父亲属第十九代孙，是“承”字辈，取名承襁。后来，父亲一直用自取的学名杨度，号哲子。晚年又号虎禅师、释虎、虎头陀。

我的曾祖父杨礼堂是一员武将，曾跟随曾国藩的部将李忠武在湖北、江西、安徽等地打仗，后来战死在疆场。因作战有功，清朝政府就让曾祖父的长子杨瑞生(号玉书)荫袭了曾祖父的官职，后升任总兵，镇守河南归德、朝阳等地。

杨瑞生是我的伯祖父，十五岁就跟随曾祖父参军打仗；自从荫袭了曾祖父的职位后，也就成了一家之主。杨瑞生有三个弟弟，二弟和三弟都早年去世，剩下四弟杨懿生(号宗彝)，就是我的祖父。杨懿生天份很高，笔底功夫也比几个哥哥强，能写文章，也能画几笔仕女。可惜他身体羸弱，经不起劳累。他平日喜饮酒吟诗。因为家境贫寒，无法谋生，一切都靠他哥哥帮助。伯祖父杨瑞生设法为我的祖父捐了个候补县官。这是个只拿薪俸不办事的官职，所以做起来很省力。后来，伯祖父又将我的祖父介绍到曾国荃的手下，当了一阵子文书。但是，我祖父身体羸弱，且嗜酒，后因饮酒过多而吐血，抱病返乡，不久就一病去世。死时还不到三十岁，遗下我年轻的祖母李氏，带领着三个孩子——我父亲、三叔和姑母。孤儿寡母，没有生活来源，只能依靠